

翦羽伯贊全集

第一卷

翦伯赞全集

第一卷

中国史纲 第一卷
史前史 殷周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翦伯赞全集 / 翦伯赞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434-6807-8

I. 翦… II. 翦… III. ①翦伯赞（1898~1968）—全集
②史学—中国—文集③史评—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624 号

书 名 翦伯赞全集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07

字 数 60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6807-8

定 价 800.00 元（共十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翦伯赞全集》的编辑工作开始于1998年春。学生受翦斯平、翦天聪两位师兄的委托主持编务，并与河北教育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合同。所收专著和文集(包括新编的)为17种，共约有600余万字，编为10卷。2008年4月16日，为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届时《全集》出版，将为亲朋好友、学生及学界同仁遥向翦先生表达缅怀之情。

还有几件与出版有关的事项在此说明如下：

(一)《全集》即将出版，对曾热心指导、积极支持或参与工作的北京大学师辈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北京大学原校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郝斌，历史系原主任王天有、现系主任牛大勇、党委书记王春梅，师弟叶庆雨、邓经元，翦老孙辈翦大畏、翦宴、翦安、翦晓苹、族孙翦英海及刘凤翥、田珏、陈秉才、胡志宏，学生岳庆平、宋一夫、刘华祝、冷鹏飞、于振波、龚汝富、张冠梓、朱清、张怡青、张海青等表示感谢。对以往曾参与校订工作的众多同志亦表示谢意，他(她)们的芳名已载入各卷“说明”中，永志不忘。

(二)《全集》各卷所收内容：

第一卷 《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

《翦伯赞传略》(代序)(张传玺撰)

附录 附一 《翦伯赞大事年表》(张怡青撰)

附二 《翦伯赞著述目录订补》(杨济安编辑、张传玺
订补)

第二卷 《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

第三卷 《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二辑

第四卷 《中国史论集》第三辑(新编)、《历史问题论丛》增补本

第五卷 《历史问题论丛续编》(新编)

第六卷 《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社会史论战集》(新编)

第七卷 《时事评论》(新编)、《书信与诗歌》(新编)

第八卷 《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次欧洲大战论集》(新编)

《苏俄集体农场》(斯大林著、翁伯赞译)

《二战开始前后的苏联论集》(新编)

第九卷 《中国史纲要》(主编)

第十卷 《中外历史年表》(主编)(校订本)

(三)《全集》所收各书的出版或编辑、校订情况，书前都有“说明”。这次编辑，内容编次、行文、观点一律不做改动。惟改用简化汉字、横排。日文稿照旧未译。

(四) 未收书四种：

《义和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四册，主编

《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四册，主编

《历代各族传纪会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至八册，与郑天挺主编

(五)《全集》不“全”，这是我们参加工作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原因之一是有些文章找不到；原因之一二是文章找到了，但报刊破损或字迹不清。再则是我们的工作也有不少疏漏之处。这次《全集》付梓，只是搜集、整理翁著的一个阶段，惟愿天假时日，我想继续工作下去，尽可能使《全集》名实相副。

张传玺

2006年9月10日

责编的话

《翦伯赞全集》的付梓，是我平生作为责任编辑最后一个选题的终结。此时，从心底涌现出的话语，只有笔耕墨播纸做田了。

作为责编《翦伯赞全集》的我，用双手捧起先师的著作时，感到沧桑而厚重。编完《全集》的我，如释重负，感到欢快而欣慰。翦老的勤奋好学，持论严谨、史才丰厚、诲人不倦，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间，我更加敬重翦老的学者风范。他总是在用心思索着，踏实地行走着，笃志史学，无坚不摧。翦老将自己的颇多著述给予世界，看起来不过是一件寻常的表面现象，实际上它们是注入文化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在他的专著、文章、诗歌、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流淌着的汗水和滴着的血。我感受着他的睿智和造诣的博大精深。他不愧为一代尊师，一代史学大家。

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一位老师就是翦伯赞先生。我仰慕已久先生出现在眼前，近在咫尺，真的兴奋不已。他在迎新会上的讲话，是我开始学习历史的第一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教导我们怎样学习历史。他说：你们选择了历史系，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唯物史观，去学习历史，去研究历史；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把观点与史料结合起来，去学习历史，去考究历史。他还要求我们：心要热，头脑要冷。这是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特点说的，告诫我们：要有热心，但更要有一份冷静和缜密。这分明是在嘱咐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这代青年学子，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学习，怎样去研究问题。46年的悠悠岁月，都未曾在脑海中消减过，或抹掉过这片真诚的话语，至今都在指导着我的人生路。38岁以后，我感觉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满意这

份职业。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凭借个人对市场需要的考量和兴趣去自由组稿,我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充分享受了这个好处,依据我社有气魄的出版意图,利用自己对历史专业有所熟悉,对编辑工作有所热爱,且不屑卷入琐事之争,赢得的是心中的一块净土,自在安宁、自得其乐地做了对社会有用的事儿。比如,《翦伯赞全集》是1995年以来与《李大钊全集》、《范文澜全集》、《邓广铭全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先后确立的重大学术选题。那时离我退休还有8年时光,我决心依托自己所学专业和做编辑的多年经验以及全部精力,奋力拼出、再现祖国历史文化的部分经典之作。到如今,这些选题做完、做好、出版了,在先师面前可以落个心安理得,足矣!

十几年,一晃而过,回首往事,饱尝艰辛,仍隐约可见苦与累的身影。前面说的五大选题,做起来真的不易。起初,我认定这是自酿自制的美酒,自酌自饮不成,只有学界师友与我同斟共饮,分享醇香。这还是我自己堆造的山和海。自己担着,腰会弯;自己蹚着,难上岸。仍需学界师友,与我共同肩负,分担困苦。时时感到自己在这些重大选题面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好在多年来,职业的使命感,编辑本能具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团结了诸多学者和挚友。他们是我的靠山,我的脊梁,支撑着我,相辅而行,终将完成这些著作的及时出版。有人曾说:这类图书市场太小。我说:不尽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含有33位历史学家的57部鸿篇巨著,不是已重印3次吗?另外,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需要的这个视角去考量市场的现今与永远,应该说,我们正在通过出版业尽心尽力收拾好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主体,使之与现代文化更好地交融,那才能为创造、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可能。“中国制造”的品牌图书会风靡全球的,难道说这个市场还不够大吗?哪个出版者如果漠视、抛弃民族的文化、祖宗的巨作,那将在出版史上留下的不是痕迹,而是遗憾。

我经常默念的这些书的出版,终于成真。得力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几届社长对于出版方向的紧紧把握和坚定不移;得力于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邓广铭带给我的感动。他们说“这是功德无量之举”;得力于学术界邢贲思、任继愈、何兹全、戴逸、金冲及、漆侠、田余庆、

蔡美彪、张传玺、李学勤、彭明、张静如、苑书义、刘桂生、苏双碧、瞿林东、杜荣泉、林甘泉、陈高华、王宏志、臧嵘、陈振、陈祖武、张希清、邓小南等诸多史学家的身体力行的许多理念性的、方法上的指点。他们带给我的又一感动是说我们这些书的出版系“有益当代、惠及后人”之举。两个“之举”使我有了足够的底气，增添了平生最大的勇气和力量。多年如一日，含辛茹苦，默默地承受着、坚守着，直到做完《翦伯赞全集》这部书稿。

《翦伯赞全集》的编辑过程，有杜荣泉等十几位专家学者帮我审校了全部书稿。《全集》600万字的文章、著作撰写于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除要做忠实原著的校对外，还要做全面细致的史料核查；统一版式；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异体字为正体字；统一中外译名、古今地名、数字等用法，是相当劳神、费力的苦差事，但大家无怨无悔。杜荣泉、张文、王明信、耿小红、李永昌、秦进才、张苗、李达、陈旭霞、王萍、柳刚永、袁鸿蕙、孙雪松等师友、同仁都积极参与了校定工作，十分认真、仔细、精心、精到，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我也非常感谢张传玺先生主持整理校勘《全集》，给我机会，让我参与，也好告慰先师。从张传玺先生整理《全集》到我责编《全集》，是翦老两代学生通力合作10年才成就其出版的。这要归功于翦老学识和精神的感召，品格魅力和境界的启迪；归功于学生对先师那份无比的尊重和爱戴，并且形成了我尽编辑之责，永不懈怠的动力。即使置崇山峻岭之中，也会蜿蜒着我作为一个老编辑人蹒跚的足迹，这足迹不会消逝，还会带着深深的印迹，在编辑生涯结束后，令我永远品味着什么是乐在其中。

张惠芝

2007年10月6日于石门书屋

翦伯赞传略（代序）

张传玺

翦伯赞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著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和《中国史论集》载誉史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凭借广博的历史知识，撰写了大量的时论，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对内独裁的反动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从50年代后期起，曾多次发表论文，对史学研究中的“左”倾思潮提出批评。为此，他在60年代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错误的批判，被诬为宣扬“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以致被迫害致死。翦伯赞精通文史，一身正气，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屈从于任何强权和暴力，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楷模。

—

翦伯赞，名象时，以字行。湖南省桃源县翦家枫树岗人，维吾尔族。1898年4月1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生。翦伯赞的祖先原居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原属高昌回鹘族。南宋末年，归附于蒙古族，随元军灭南宋，封为将军。明朝初年，归属于明，以功封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常驻今湖南常德、桃

源一带，明太祖朱元璋并赐姓翦氏。^①至清朝，翦氏族人转军为民，定居常、桃，世奉伊斯兰教，只与本族和回民通婚，但却逐渐采用汉语、汉文。翦伯赞父名奎午，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伯赞为长子，其下有1弟3妹。

翦伯赞5岁时，入本村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0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即漳江小学。12岁，转入常德中学预科，14岁入本科。翦伯赞自幼聪明过人，学习勤奋，对文章、诗词、儒经、诸子无所不读，还通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相当流行，他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曾立志学习一些能够振兴祖国实业的本领。1916年夏，他中学毕业，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入学不久，他对那些从欧美贩卖过来的课程很厌倦。1个月之后，便愤然离校，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关于商校，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所新创办的学校，功课偏重于技术，教授都是新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洋学生。虽说他们对中、西文化都不甚通，可是介绍了不少有关康德、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一些理论和著作。”他对这些新思想很感兴趣，并试用新学到的形式逻辑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这对于他后来走向史学研究的道路是有关系的。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不久武汉地区也沸腾起来。翦伯赞怀着满腔激情积极参加了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大学毕业。严酷的现实是“毕业即失业”，他曾有半年多的时间逡巡街头，备尝失业之苦。后来，经一位同乡的帮助，他到长沙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教了半年书。秋天，又经父亲的推荐，回到母校常德中学，改任英语教员。他在这所学校任职4年，认真地研读中国古代历史和有关当时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籍。

1924年夏，他远涉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

^① 翦伯赞：《我的氏姓，我的故乡》，《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3～409页。

这时他还相信“实业救国”，想在这所名牌大学深造，以便学成归国，有所作为。可是，他对该校的课程不满意，认为大多数课程内容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侵略行为的说教或粉饰。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中严重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更使他异常愤慨。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中，阅读了大量欧美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不久，又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后，他心情异常激动，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更加关切。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他的思想在急剧变化，不想继续留在美国。次年冬天，毅然回国。

1926年初，翦伯赞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湖南常桃会馆^①，想谋求一个能够发挥其所学的职位。北京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由于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径，北京正在掀起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翦伯赞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3月18日，他与请愿的青年学生及市民群众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死难者47人，受伤者150余人，他的帽子也被枪弹射穿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次血案使刚刚回国的翦伯赞进一步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本质和狰狞的面目，打破了他憧憬多年“实业救国”的幻想，决定南下广州，走革命道路。

二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翦伯赞回到湖南老家省亲。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北伐到达长沙。翦闻讯自桃源赶赴长沙，经国民革命军外交特派员兼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董维键博士的介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董维键也是桃源人，与翦

^① 常桃会馆：湖南省常德和桃源二县的同乡会办事处。

是中学同学，后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不久，董维键介绍翦伯赞到武汉会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留总政治部工作。

1927年1月，翦伯赞奉命北上，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赴山西和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当时，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很不明朗，在看风向。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太原的局势迅速紧张起来。阎锡山不再与翦见面并限制翦的活动，翦便离开太原，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会见商震。商仍同情北伐，表示愿意及时“易帜”。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时，阎锡山已公开归顺蒋介石，归绥的局势也日益紧张。阎锡山密电商震，命令他逮捕翦伯赞，商劝告翦赶快离开归绥。翦立即离开归绥，亡命上海。

1928年春，商震率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①讨伐奉军，向河北省境进发，电邀翦伯赞到他的部队工作。5月，翦自上海抵保定，在商军政治部任委员。6月，商部进驻北平（今北京）。这时北平的党政部门迅速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所把持，并开始“清党”。不久，商部的政治部亦为反动分子所控制，他们要翦伯赞进行“党员登记”，并限制他的活动，翦伯赞对此非常气愤，他拒绝“登记”，并向商震表示了他的愤慨，于8月间毅然离开商部。他又回到了常桃会馆，与湖南同乡、青年学者吕振羽、谭丕模结识，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翦伯赞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十分痛恨。1929年，国民党元老覃振（字理鸣）到北平进行政治活动^②，主要

^① 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1926年，阎联合张作霖击败西北军，进占绥远，所统辖军队称晋绥军。1927年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② 覃振：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24年国民党改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1946年去世。

目的是促成北方拥有较强兵力的阎锡山、冯玉祥两部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覃振是翦伯赞的小同乡，又与翦父翦奎午是同学。他到北平后，即与翦会面。以翦在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到山西工作过，即约翦为中国国民党山西省代表，准备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次年8月，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由于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中失败，亲蒋的张学良以调停为名，率领奉军入关，进驻平津，“扩大会议”被迫中断。覃振等人逃到南方，又联络广东、广西的反蒋势力，于1931年5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仍邀请翦伯赞以山西省代表名义与会。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不少政客以“共赴国难”为名，在拥蒋派与“反蒋派”之间斡旋，许多反蒋人士也动摇起来。于是“非常会议”草草收场，许多与会的头面人物也以“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相标榜，前往南京做官。覃振邀请翦伯贊同往南京做官，翦严肃地指出，“共赴国难”的口号是一个骗局，劝覃振不要上当。两人由于意见分歧很大，从此分手。翦去上海，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革命活动。

1929年，翦伯赞在北京时，参加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这一论战是由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当时，一批拥护蒋介石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已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反对在中国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则坚决反对这些观点和理论。他们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是成功了，而是失败了。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今后要走的道路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场论战至1930年夏，在中国的许多报纸、杂志上逐步展开，翦伯赞密切关注并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

1930年11月，蔡伯赞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一文^①，重点批判了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的生产形态”之说。他指出，论者所举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些特质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他说：“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他进一步分析了近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完全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的农村社会的确已经达到了转变的时期”，即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同年12月至次年2月，他接连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3篇^②，利用历史文献和甲骨文等考古资料，进一步论述他对“前封建时期”中国社会的观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进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疯狂侵略义愤填膺。蔡伯赞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不久，他在天津主编的《丰台旬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世界资本主义最高发展中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③。他在文中慷慨地写道：“只有日帝国主义者御用博士矢野，才说满蒙不是中国领土；只有日帝国主义者无耻的政客芳泽，才说这次出兵满蒙和上海，没有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只有发愤为奴的熙洽，才说日帝国主义者这次的暴行是正当的自卫；只有日帝国主义者的军阀，才说他们侵略东三省是剿匪；只有中国无能的直接责任者，才以为取消反日运动，限制抗日的义勇军，可以缓和日本的大炮；只有拜金的

① 北平《三民半月刊》，5卷6期。

② 北平《三民半月刊》，5卷7、8、11期。

③ 天津《丰台旬刊》，1卷1期。

资本主义学者，才梦想金元帝国主义的哀怜；只有特殊的新式政治家，才主张在不讲公理的国际联盟作秦庭之哭；只有机械论的革命家，才说这次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是完全对苏俄的威胁。”他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及其“大陆政策”，指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文章最后警告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你们不要期待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回心转意，再不要期待国际联盟的主持公道，再不要期待任何帝国主义的仁慈。你们要知道，只有我们民族的自决和一切弱小民族的大联合，才能解除空前的侵略；只有国际帝国主义自己的火并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才能解除这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矛盾中所发生的这一个死症。”接着，又在该刊第2期发表《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①一文，揭露批判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错误态度，批判了所谓的《政府迁洛宣言》和《郭泰祺宣言》，指出：“我们决不学着统治阶级的‘忍辱’而不‘负重’，我们要把这个民族革命的重责，从统治阶级的荷包中，移到劳苦大众的肩上来。”文章还提出了四条行动纲领：“第一，要排斥妥协和动摇的领导，树立一个真正由劳苦群众所建立的民主政权；第二，要紧密民众与兵士的联合；第三，要把反帝国主义运动普遍到80%的农民，形成一个一致向前的广大的阵势；第四，要把反帝国主义的意义由经济的斗争，进到武装的斗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革命的成功。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世界的两方面》、《资本主义临于没落的几个象征》等文章^②，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宣传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的情况。他还和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③一书（1932年8月出版），用丰富的资料和大量

^① 天津《丰台旬刊》，第1卷第2期；原题《踏进反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后自改今题。

^② 依次发表于《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9、10期，《丰台旬刊》第1卷第2、9期。

^③ 该书分上、下两册，吕著上册，翦著下册，北平书店，1932年出版。

的事实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状况，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指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光辉前途。

翁伯贊的上述言论激烈地揭露、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亲日派、卖国贼的可耻嘴脸。这就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1933年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串通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驱逐出天津。翁伯贊南下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1933年夏，中共在上海的重要地下工作者董维键来访，向翁伯贊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并建议他设法争取覃振先生同情革命。时覃振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副院长。这年9月，覃振到上海，邀请翁伯贊以覃私人秘书的名义移住南京。次年5月，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情况，翁伯贊陪同前往。他们访问和游历了安南（今越南）、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法、英、荷、比、德、波、捷、奥、意、瑞士、美、日等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历史状况多所考察。回国后，翁伯贊配合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游记的形式，发表了《墨索里尼和洛森培的“和平新论”》、《在红卍字旗下》、《维也纳——在忧郁中》、《上帝之城》^①等文，揭露批判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德国法西斯理论家洛森培、西班牙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等的反动理论及其侵略行径。

这时，中共的高级干部董维键在上海被捕，在闽赣地区领导打游击的李六如亦在战争中被俘，两人同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区司令部的监狱中。中共将此事告知翁伯贊，翁伯贊即请覃振设法营救。不久董、李二人获释。1935年冬，国民党迫于形势，希望通过一些渠道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进行和平谈判。陈果夫、陈立夫派谌小岑进行此事。谌即拜访了翁伯贊，翁伯贊建议他与在北平民国大学教书的吕振羽联系。这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

^① 发表于上海《世界文化》，第1卷第6、8、10、11、12期。

谈判渠道至 1936 年上半年正式开通。中共方面由华北局派周小舟、后又增补吕振羽为正式代表，国民党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派曾养甫为正式代表，谈判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进行，并达成初步协议。^① 翦伯赞为这次谈判做了不少工作。1937 年 5 月，他在南京经吕振羽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不公开，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理论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

三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国土大片沦丧。9 月，翦伯赞奉中共之命，以抗日爱国人士的身份回湖南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等发起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其他负责人中有不少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覃振任湖南分会会长，翦伯赞任常务理事，主持会务，主编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文协分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的一个重要合法机构，《中苏半月刊》是中共在湖南省重要的合法宣传刊物。文协和《半月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动员全面抗战，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翦伯赞还兼任抗敌后援会的常务理事。文协和后援会经常组织座谈会、讲演会，开办俄语补习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都起了宣传、推动抗战的作用。

1938 年 8 月，长沙新知书店出版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这是我国早期的一本比较系统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也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宣传全面抗战的专著。该书的序言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

^① 周恩来：《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致曾养甫》、《国难转机，在此一举——致陈果夫、陈立夫》，《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98~102 页。